



从汉语史看音变过程的几种模式^{*}

赵 彤

提要 从汉语史来看,音变过程除了新语法学派主张的“语音渐变、词汇突变”和词汇扩散说主张的“语音突变、词汇渐变”两种模式以外,还存在“语音渐变、词汇也渐变”和“语音突变、词汇也突变”两种模式。从演变结果来看,单纯分化的音变通常是语音渐变,合流的音变更可能是语音突变,“近似合并”则可能是语音由渐变到合流的过渡。

关键词 汉语史 音变过程 渐变 突变 分化 合流

1. 引言

音变过程是历史语言学非常关心的问题。经典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对音变过程的认识比较单一。随着词汇扩散理论的提出和社会语言学对共时语言中变异的研究,人们对音变过程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从音值和词汇两个方面来观察音变过程,不外乎有以下四种可能的模式:1)语音上渐变,词汇上突变;2)语音上突变,词汇上渐变;3)语音上渐变,词汇上也渐变;4)语音上突变,词汇上也突变。第一种是新语法学派的观点。第二种和第三种是王士元(1969)提出的词汇扩散论的假设,他认为第二种更为可信。至于第四种,王士元认为是不可能出现的。王士元分析的是单个人的语言变化。单个人的发音在其一生当中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即使可能发生一些变化,但是通常只限于极少数的词汇。而且,语言的变化虽然可能是从个人用法开始,但是要成为一种音变就必须被全社会所接受,这显然不是个人的语言变异能够实现的。所以要观察音变的过程就要搜集尽可能多的样本。实际上词汇扩散的一些个案研究已经考虑到了音变的个体差异(如王士元、沈钟伟,1991)。王士元后来也说“词汇扩散不仅是词的变化扩散,也是从说话人到说话人的变化扩散,还是从社区到社区、从村到村的变化扩散”(冯胜利、叶彩燕,2014:97)。所以本文讨论的音变过程是就一个语言的“整体”而言的。

汉语有着丰富的历史文献,汉语史研究近年也取得了诸多进展。历史文献虽然记录的只是语言在一个个历史时期的片段,但是对于音变过程也能够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对于已经完成的音变,观察其在词汇上是渐变还是突变,主要看相同语音条件下的词汇是否都发生了同样的音变。如果所有相同语音条件的词汇并没有都发生相同的变化,而且没有语音以外的或者是其他外来因素(如方言)的影响,就说明词汇上是渐变的。如果所有相同条件的词汇都发生了同样的音变,并且找不到反映渐变的中间环节,则很可能词汇上是突变。观察语音上是渐

^{*} 本文初稿曾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16年10月)和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语言研究中心(2017年9月)报告过,收到两处同仁很多有益的意见。《中国语文》评审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此并致谢忱。





变还是突变,首先是看从发音生理上是否存在渐变的可能。如果演变前后的两个音在发音生理上不具备连续性,那么就只能是突变。如果演变前后的两个音在发音生理上具备连续性,则可能是渐变也可能是突变,还需要借助反映中间环节的材料来判断。从汉语史来看,上面提到的音变过程的四种模式都是存在的。

2. 语音渐变,词汇突变

新语法学派认为语音的演变是在说话人不知不觉中以渐变的方式进行的。既然说话人对音变没有知觉,那么凡是符合同一条条件的词在演变上的机会就是均等的,都要发生同样的变化,也就是词汇上突变。所以新语法学派标志性的口号就是“语音规律无例外”。对于语音的渐变,还需要做一些说明。语言渐变的过程并不一定是匀速的,可能有的阶段快一些,有的阶段慢一些。而且音变的过程也不一定是可以无限细分的,还要受人的发音和听觉能力的制约。这种音变的过程就像时钟上的秒针,有的时钟的秒针是平顺地运行的,而有的时钟的秒针是跳跃式地运行的。下面看汉语史的例子。

2.1 见系细音顎化

三十六字母中的见 k 、溪 k^h 、群 g 、晓 h 、匣 h 等在细音前今读变为舌面前音^①,这是大家熟悉的演变。以见母为代表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

$$k \rightarrow t\check{c} / _i, y \quad (\text{音变 1})$$

这个音变的过程在语音上应该是渐变的:舌根音声母受到后面前高元音的影响,发音部位逐渐前移,演变为舌面前音。这个音变过程在汉语方言中还能够找到一些痕迹。中古见系细音字在胶东方言中多读舌面中音 $[c]$ 等,正处在由舌根音向舌面前音发展的中间环节;其中有的方言(如青岛)发音部位更靠前一些,接近舌面前音(宫钦第,2008)。郑州和洛阳方言是分尖团的,见系细音顎化,精系细音不顎化。据卢甲文(1992:11)和曾光平等(1987:5)的描述,这两处方言的舌面音声母发音部位比北京话要偏后。这些方言展示了见系声母在细音前发音部位由舌根向舌面前逐渐移动的演变轨迹。

文献资料对于这个音变的过程没有很清晰的反映。成书于1743年的《圆音正考》是专门辨别尖团音的,说明当时尖团音已经开始相混,见系细音应该已经是舌面前音。在此之前的韵书,见系的洪音和细音一般都还是归在一类的。不过,正如耿振生(1992:148)所说的:“十七八世纪的韵书不反映这一现象,不表明那时的舌根音没分化,而是因为等韵作者习惯于运用音位学的原理审音,把 $[t\check{c}]$ (或者 $[c]$) 类与 $[k]$ 类当成一套声母来处理。”所以,文献资料虽然只显示了音变的结果,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现代方言和语音演变的一般规律推测见系细音顎化在语音上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这个音变在词汇上是突变的,也就是说,凡是符合条件(后接 i 或 y)的字都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所以现代北京音系中舌根音声母不会拼齐齿呼和撮口呼。关于这一点需要做一些说明。首先,这一音变是近代发生的,其语音条件不能根据中古音,而要根据近代音。在《中原音韵》中,有些中古细音字变成了洪音,如止撮合口三等(如“归葵”)、蟹撮合口三四等(如“鰕奎”)和宕撮合口三等阳声韵(如“匡狂”);有些洪音字变成了细音,主要是开口二等牙喉音字(如

^① 本文标音采用国际音标,如果不会引起误解,一般不加方括号,引文则一般按原文的格式。古音的拟音依照殷国光等(2016)。





“家江”)。所以有些中古见系三四等字没有顎化是因为在音变发生时已经失去了演变的条件。其次,拿近代的语音条件来衡量,似乎也还是有例外,比如《中原音韵》中“客”有 k^hiai 和 k^hie 两读,可是今读 $k^hɤ$,声母并没有顎化。这其实是文白异读的造成的,今读并不直接来自以上读音,而是来自文读。北京话“客”字白读为 $tɕ^hie$,来自 k^hie ,同样也发生了顎化的音变。又如“楷模”的“楷”字,《中原音韵》是 k^hiai ,今读是 k^hai ,声母也没有顎化。这是因为在顎化音变发生之前韵母发生异化音变,韵头的 i 失落了(参考下文“音变4”)。成书于1606年的《合并字学集韵》(以下简称《合韵》)中,“楷”已经有 k^hiai 和 k^hai 两读。1886年出版的《语言自述集》(以下简称《自述集》)中“楷”有 $tɕ^hiai$ 和 k^hai 两读^②,前者是由 k^hiai 发展来的,今读只保留了后者。所以,这些例外并不是符合条件的字音没有变化,而是今读另有来源。

2.2 假摄开口三等主元音高化

中古假摄开口三等字在《中原音韵》中收在“车遮”韵,主元音 a 由于介音 i 的影响高化为 $ɛ$ 。这一音变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

$$a \rightarrow \epsilon / i_# \quad (\text{音变2})$$

这个音变的过程在语音上应该也是渐变的,即主元音 a 受介音 i 的影响逐渐向前、高移动。这个过程从文献资料中可以找到一些痕迹。《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微韵后毛居正案语说:“所谓一韵当析而为二者,如麻字韵自奢字以下,马字韵自写字以下,禡字韵自藉字以下,皆当别为一韵,但与之通用可也。盖麻马禡等字皆喉音,奢写藉等字皆齿音,以中原雅声求之,复然不同矣。”^③赵荫棠(1936/1956:107-108)、王力(1958/1988:195)等据此认为12世纪车遮韵已然形成。李子君(2012、2014)、丁治民(2013)根据《礼部韵略》中麻韵二等和三等排列上界限分明的现象,认为麻韵已经分化,车遮韵已经形成,从而把车遮韵形成的时代提前到了11世纪。金代韩道昭《五音集韵》麻韵“迦”字下注说:“此字元在戈韵收之,今将戈韵等三等开合共有明头八字,使学者难以检寻,今韩道昭移于此麻韵中收之,与‘遮车蛇奢’者同为一类,岂不妙哉?”赵荫棠(1936/1956:108)认为这条也反映车遮韵独立的趋势。《五音集韵》的这条注似乎只能说明果摄三等并入到了假摄,并不能说明假摄二等和三等的韵母已经分化。另外,从宋词用韵来看,假摄二三等的分化并不明显(鲁国尧,1991)。综合来看,宋金时期应该还处在车遮韵形成的中间阶段,有的方言可能发展得快一些,有的方言可能慢一些,所以不同的韵书和韵文中的反映不完全一致。

这个音变在词汇上也是突变的,假摄三等字在《中原音韵》中凡是出现的全部收在车遮韵,没有收在家麻韵的。“瑯”字在《中原音韵》同样收在车遮韵,与“爷耶鄞”同音,《合韵》和《自述集》也都是 $iɛ$,今读 ia 应当是借自其他方言,由于是地名的缘故。

3. 语音突变,词汇渐变

针对新语法学派的观点,词汇扩散说提出:语音演变的过程在音值上是突变的,也就是说由某个语音形式直接变为另一个语音形式,不需要经过任何中间阶段;在词汇上是渐变的,即相同语音条件的词不是一起发生变化,而是逐个发生变化,通过新旧两读共存逐渐向新读过渡。下面是汉语史的例子。

② 为了便于比较,《语言自述集》的标音改作国际音标。

③ 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 疑母失落

三十六字母的疑母是个舌根鼻音 η , 近代以后这个声母失落成为零声母。这一音变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

$$\eta \rightarrow \emptyset / _V \quad (\text{音变 3})$$

由 η 到零声母的演变在语音上不大可能是渐变的, 这个 η 要么发音, 要么不发音, 基本上不可能存在中间状态, 所以这个音变在语音上应该是突变的。

这个音变在词汇上是渐变的。《中原音韵》中大部分疑母字已经变成零声母, 比如鱼模韵去声疑母字“误悞悟寤”与影母字“恶污”同小韵, 先天韵平声阳疑母字“妍言研”与喻母字“延筵筵蜒缘焉沿”同小韵。但是还有少数疑母字与影喻母字对立, 比如江阳韵上声疑母字“仰”同喻母字“养”、影母字“鞅”对立, 萧豪韵去声疑母字“傲舅熬”同影母字“奥懊澳”对立。说明这些疑母字的声母还没有失落。疑母字在《蒙古字韵》中有的 η -, 有的是零声母, 也反映了这一音变在词汇上是渐变的。同时由于《蒙古字韵》是用八思巴字注音的, 并没有反映疑母到零声母的演变存在中间形式, 更说明语音上是突变的。到了《合韵》, 已经没有了独立的疑母, 《中原音韵》中还保留疑母的字基本上也都变成了零声母。

与疑母失落几乎同时还有另外一种音变, 就是疑母细音变为舌尖鼻音 n 。《中原音韵》中疑母字“啮鼻龊”与泥娘母字“捏聂蹶镊”同小韵, 已经变成了 n -。值得注意的是, “倪逆牛”等字在《中原音韵》中都是零声母, 分别与“移逸尤”同音, 而在《合韵》中都有影母和泥母两读, 今读则都是 n -。《中原音韵》中已经是 n - 的“啮鼻”在《合韵》中也都有影母和泥母两读, 今读也是 n -。可见疑母细音变 n 在词汇上也是渐变的(语音很可能也是突变), 开始的时间可能略早于疑母失落, 后者更加强势, 造成了前者的中断, 所以只有少数疑母细音字今读是 n -。《中原音韵》和《合韵》两部韵书对于相关字音的记录生动地反映了疑母的演变过程: 词汇上渐变, 两种音变相互竞争, 而且这两种音变在不同的个人之间应该也是不同步的, 所以导致了不同韵书当中记录的差异。疑母的演变过程可以用下表描述:

表 1 疑母在近代的演变^④

	误	言	仰	傲	啮	牛	
《中原音韵》前	η	η	η	η	η/n	η/n	$\eta \rightarrow n / _i$ 开始
《中原音韵》	\emptyset	\emptyset	η	η	$(\emptyset)/n$	$\emptyset/(n)$	$\eta \rightarrow \emptyset / _V$ 开始
《合韵》	\emptyset	\emptyset	\emptyset	\emptyset	\emptyset/n	\emptyset/n	$\eta \rightarrow \emptyset / _V$ 继续
现代	\emptyset	\emptyset	\emptyset	\emptyset	n	n	淘汰异读

3.2 皆来韵齐齿呼韵基单化

《中原音韵》的皆来韵有 iai 韵母, 来自蟹摄开口二等的牙喉音字和梗摄开口二等入声的牙喉音字。其中来自蟹摄的后来大部分演变为 ie , 韵基由 ai 变成 ϵ , 单元音化了。这个音变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

$$ai \rightarrow \epsilon / i _ \# \quad (\text{音变 4})$$

④ 表 1 和表 2 中加括号的形式表示该读音虽然在相应的韵书中没有记录, 但是因为在其后的韵书中仍有记录, 可以推测该读音在口语中实际应该存在, 否则就无法解释后代的来源。比如“牛”在《中原音韵》中只有零声母一读, 但是在《合韵》中有零声母和 n - 声母两读, 如果在《中原音韵》时代没有 n - 声母的读音, 就无法解释后来 n - 声母的读法是怎么来的。





通常认为这个音变是韵头的 *i* 对韵尾的 *i* 产生异化作用加上两头的 *i* 对韵腹的影响形成的。可是如果先发生异化, *iai* 就会变成 *ia*, 从而与来自家麻韵的 *ia* 合流, 失去变为 *ie* 的条件。所以薛凤生(1986:102)提出这样的解释:“就音位的形态说, 韵母 /*yay*/ 的韵腹元音是央低元音 /*a*/, 但就实际发音说, 因受韵头与韵尾两个前半元音的双重影响, /*a*/ 在此处必然是一个较前与较高的同位音 [ɛ] 或 [e]。由于这个韵母含有相同的韵头与韵尾, 后来便因异化作用而丢掉了韵尾, 也就是我们此处讨论的音变, 其变化过程实为 /*yay*/ = [yey] → [ye] = /ye/, 因此变入了‘乜斜’辙而不入‘发花’, 后来又因‘乜斜’与‘梭坡’合辙而变为今读 /*yə*/。”可是如果是韵腹先高化, 韵基就会与 *ei* 合流, 而在文献中还没有见到这样的记录。所以不论是韵尾先被异化掉, 还是韵腹先高化, 都不能合理地解释这一音变。

早在《中原音韵》中,“客额吓”等字已经有皆来 *iai* 和车遮 *ie* 两读。《合韵》中“鞋解”也有 *iai* 和 *ie* 两读。到《自述集》中, 大部分 *iai* 已经变为 *ie*, 只有“楷拈涯挨隘”等少数几个字还有 *iai* 的读法。1898 年出版的《官话萃珍》中就已经没有 *iai* 韵母了。不过在北京话中,“崖”字 *iai* 的读音还存在了一段时间。可见这个音变从一开始就是由 *iai* 直接变为 *ie*, 以两读的形式在词汇中扩散, 这个过程在晚近的材料中还能够观察得到。

从上文可以看出, 这个音变在词汇上是渐变的, 前后经历了大约 600 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有另外两股力量对这一音变造成了影响。一个是 *iai* 韵母出现了另外一种演变方向, 就是失去韵头变为 *ai*。《中原音韵》中 *iai* 韵的字, 在《合韵》和《自述集》中有一些有 *ai* 韵的异读, 如表 2 所示:

表 2 部分 *iai* 韵字在近代的演变

	骸	楷	街	崖	涯 ^⑤	挨	矮	隘	搯
《中原音韵》	xiai	k ^h iai	kiai	iai	ia, (iai)	iai	iai	iai	iai
《合韵》	xiai, xai	k ^h iai, k ^h ai	kiai	iai, ai, ia	ai, ia, (iai)	ai, (iai)	ai	ai, ɛ, (iai)	ai, ie, ɛ
《自述集》		tɕ ^h iai, k ^h ai	kai, tɕie	ai, (iai, ia)	iai, ai, ia	iai, ai	ai	iai, ai	
现代	xai ^⑥	k ^h ai	tɕie	ia, (iai)	ia	ai	ai	ai	ɤ

由 *iai* 到 *ai* 的变化在语音上也是突变(韵头 *i* 要么存在, 要么不存在), 词汇上也是渐变。这一音变主要发生在零声母字中, 以致于阻断了零声母 *iai* 韵字向 *ie* 的演变, 在《合韵》中只有一个“搯”字有 *ie* 的读音。这个现象也是可以解释的。因为 *iai* 韵母只出现在舌根音声母和零声母字中, 其中的舌根音声母由于发生了腭化, 对 *i* 韵头起到了保护作用, 而零声母字则不受这个限制。

还有一个影响来自入声字文读音势力的扩大。《中原音韵》中来自梗摄开口二等入声的 *iai* 韵字(如“革隔客额”), 在《合韵》中都出现了 *ɛ* 韵的文读, 今读 *ɤ* 韵是来自文读^⑦, 只有“客隔”等个别字还有 *ie* 韵的白读。

4. 语音渐变, 词汇也渐变

如果一个音变在语音上是渐变的, 也就是在说话人不易察觉的状态下逐渐进行的, 那么所

⑤ “涯”字在《集韵》中已经有麻韵的异读, *ia* 的读音是来自麻韵。

⑥ 据王璞的《国音京音对照表》(商务印书馆 1921 年版),“骸”还有 *iai*, *ie* 的读法。

⑦ 今音的文读或许不是直接来自《合韵》, 将另文讨论。





有相同条件的词汇发生变化的机会应该是均等的,所以在词汇上一般来说应该是突变。不过从汉语史来看,有的音变似乎语音上渐变,词汇上也渐变。

4.1 果摄主元音高化

中古果摄的主要元音是 α , 到《中原音韵》中, 细音与假摄三等一同变为 ϵ (音变 2), 在车遮韵; 洪音则高化为 o , 在歌戈韵。这里讲的是后者, 如以下公式所示:

$$\alpha \rightarrow o / C(u)_{\#} \quad (\text{音变 5})$$

元音高化是常见的音变, 果摄主元音高化在汉语方言中也相当普遍, 其过程在语音上应该是渐变的, 比较域外汉字音和汉语方言中果摄字的读音可以看出其演变轨迹。

表 3 果摄洪音字在域外汉字音和汉语方言中的演变^⑧

	朝鲜汉字音	日本汉字音	南昌	长沙	合肥	温州	苏州
歌	ka	ka	kɔ	ko	kɔ	ku	kəu
棵	kwa	ka	k ^h uɔ	k ^h o	k ^h u	k ^h u	k ^h əu

从表 3 可以看出, 有的方言高化的程度更甚, 其中苏州高化后又发生了复化。

文献中反映这个音变过程的材料不多。沈钟伟(2006)利用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探讨了辽代北方汉语的语音特征, 据他的研究, 果摄的元音是 α , 反映了在《中原音韵》之前, 北方汉语中果摄主元音高化的进程已经开始。

从词汇上来看, 果摄洪音字绝大多数都发生了高化, 可是“他那爹爹大阿”等少数几个字今读韵母是 a , 似乎是躲过了高化的音变。不过从近代的几种资料来看, 这些字也都曾经发生了高化的音变。

表 4 “他大”等字的读音在近代的演变^⑨

	他	那 ^上	那 ^去	大	阿	爹	爸
《广韵》	托何切	奴可切	(奴个切) ^⑩	唐佐切	乌何切	徒可切	捕可切
《中原音韵》	t ^h uo	nuo	nuo, na	tuo, ta	o		
《合韵》	t ^h uo, t ^h a	nuo, na	nuo, na	tuo, ta	o	tuo	puo, pua
《自述集》	t ^h o, t ^h a	no, na	na	to, ta	o, a		pa
现代	t ^h a	na	na	ta	ɤ, a	ta ^⑪	pa

从表 4 可以看出, 这几个字在《中原音韵》和《合韵》中凡是出现的都有高化的读音, 有的字反倒没有低元音的读法。所以这些字同样也发生了高化的音变。到了《自述集》, 情况发生了变化, 低元音一读占了上风。现代汉语中就只有“阿”字还有高化的一读。

果摄这种两读的情况可以再往前推到宋代。从宋词用韵来看, “他”已经在“家车”部(鲁国尧, 1991)。前文已经提到, 宋辽时代北方语音中果摄已经开始高化, 所以“他”字家车部的读音是代表了低元音的形式。《中原音韵》中“他”字只有“歌戈”韵一读, 说明低元音的读法

⑧ 朝鲜和日本汉字音据金世一《汉字古今中外多语语音比较字典》, 汉语方言据《汉语方言字汇》(第二版重排本)。

⑨ 表中只列与果摄演变有关的读音, 所以由“爹”字“陟邪切”和“大”字“徒盖切”来的读音都不收。

⑩ 《广韵》“奴个切”义为“语助”, 与代词义并不匹配。

⑪ 通常写作“大”, 本字是“爹”。参看陈燕(2003)。





很可能还不占优势。《合韵》中“他”字有两读,一在“他韵”,注“彼也”;一在“多韵”,注“非我也”。两读似有分工, $t^h a$ 是第三人称代词, $t^h uo$ 是旁指代词。《自述集》以及 1933 年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中“他”字也都有两读,但是并没有指出用法上有区别。

以上列举的材料表明,从果摄元音开始高化以来,有少部分字出现了高化和非高化两读的现象,其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两读互相竞争,最终低元音的形式取得了胜利。这个过程看起来很像是词汇扩散式的音变。不过这个音变在语音上既然是渐变的,很难想象在词汇上也是渐变的。而且从上面的材料来看,这些字其实全部都有高化的读法。也就是说,高化其实已经发生了。既然是语音上是渐变,而且已经发生了,就不应该有变与未变两读并存的情况。从词汇条件上同样也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个现象。如果说“他”“那”因为是代词而演变滞后,那么“我”也是代词,而且使用频率更高,却也同其他果摄字一样发生了高化,况且事实上“他”“那”也是发生了高化的,并不存在所谓“滞后”。

那么,果摄低元音的形式有没有可能是方言间的借用造成的呢?从读低元音的字来看,这种可能性比较小。首先,这里涉及的都是代词、称谓等基本词汇,不大容易借用。其次,从方言中相关词汇的使用来看也不支持借用说。以“他”字为例,据汪化云(2008),汉语方言中的第三人称代词可以分为“他”“渠”“伊”三类。从汪著中的材料来看,凡是第三人称代词用“他”的方言,果摄主元音都发生了高化,而在果摄保持低元音的闽方言中,第三人称代词多用“伊”,也有用“渠”的,并不用“他”。所以,“他”字低元音的读法不可能是借自果摄未高化的方言。这几个字当中,“爸”有可能是由于借用造成的。《集韵》“爸”字有“必驾切”一读,注“吴人呼父曰爸”。不过吴方言中果摄高化的程度普遍高于官话,而且假摄也高化,所以这个读音是否来自吴语还不能确定。

即使是连续式的音变,在人群中应该也是以扩散的方式展开的。很难想象,某个语言团体中,所有的人都同时开始某一个音变。音变总是从一部分人开始的,然后扩散到其他入。这在一些个案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参看徐通锵、王洪君,1986)。我们假设元代果摄高化的音变在甲、乙、丙、丁四个人当中进行的过程如下:

表 5 果摄洪音字高化过程在个体中的差异

	我	他	那	大	阿	爹	爸
甲	ηa	$t^h a$	na	ta	a	ta	pa
乙	ηo	$t^h o$	no	to	o	to	po
丙	$\eta \text{ɔ}$	$t^h \text{ɔ}$	$n \text{ɔ}$	$t \text{ɔ}$	ɔ	$t \text{ɔ}$	$p \text{ɔ}$
丁	ηo	$t^h o$	no	to	o	to	po

音变速度在个体中的差异也是造成异读的一种可能。设想元代大多数人果摄字的读音与丙或丁相同,而少数人与甲或乙相同,那么总体上的演变趋势是很明显的,少数人的读音会向多数人靠拢,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常用字比较顽固,从而形成异读。所以词汇上的条件是形成这种异读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并不是造成“例外”的直接原因。

4.2 舌尖音腭化

上古的舌尖音声母在介音-j-前腭化,演变为中古的章组声母,以不送气清音为例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示:

$$t \rightarrow t\text{ɕ} / _j \quad (\text{音变 6})$$





与见系颚化类似,这个音变在语音上应该也是渐变的。从翻译佛经来看,后汉三国时用章组字对译梵文的舌面音和舌尖音两组(俞敏,1984/1999),说明章组声母的音值介于二者之间,而晋代以后章组声母就基本上只对译梵文的舌面音(刘广和,1991、2001)。译音上的变化正反映了这个音变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这个音变似乎也有例外。据王力(1958),中古出现的结构助词“底”(即“的”)来自上古的“之”,中古出现的人称代词“你”来自上古的“尔”。“底”和“你”的声母都没有颚化,可是“之”和“尔”的声母是颚化的,说明颚化也是发生了的,并没有“滞后”。颚化与不颚化两种形式并存,在词汇上也出现了渐变,与音变5是同一种类型,只是由于读音上的分歧,两种形式被认为是不同的词了。

5. 语音突变,词汇也突变

如果音变在语音上是突变,同时在词汇上也是突变,就意味着符合某个语音条件的词汇一下子全部都改变了读音。这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在汉语史中确实有这样的例子。

5.1 闭口韵消失

中古的-m韵尾在《中原音韵》中除了声母为唇音的已经变为-n外,其他条件下还都保留着,到《合韵》中则全部变为-n。这个音变可以用下面公式表示:

$$m \rightarrow n/V_-(\text{音变7})$$

由m到n的演变基本上不可能存在中间状态,所以这个音变在语音上不是渐变,而是突变。从词汇上来看,所有-m尾字全部都变成了-n尾,没有例外。那么,这一音变是不是已经完成的词汇扩散呢?万献初(2012)考察了上百种近代韵书中-m尾的消变情况。从他的材料来看,-m尾或者独立,或者不独立,并没有发现-m尾字在哪部韵书中有-m/-n两读的现象或者是无条件地分为-m和-n两类的现象^⑫。近代的材料应该说不能算少,却没有流露出这一音变在词汇上有渐变的迹象,说明这一音变在词汇上也是突变的。

语音和词汇都突变的音变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梁敏(1987)的调查显示,在有的壮语方言中复辅音的简化在两代人之间就发生了。比如:kla³⁵(稻秧)和ka³⁵(假的)在老一代的语言中对立,而在年轻一代的语言中就不再对立了,全部是ka³⁵。而且不经提示,说这种语言的人并没有察觉两代人的发音有所不同。这就表明,在语言习得过程中,上一代语言中存在的某些对立有可能会被放弃。汉语闭口韵的消失很可能是同样的过程。明清两代韵书中对闭口韵的不同处理,除了有的韵书有意存古或者带有方言性质以外,也表明闭口韵的演变在不同的人群中是不同步的。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唐代胡曾《戏妻族语不正》诗:“呼十却为石,唤针将作真。忽然云雨至,总道是天因(阴)。”《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有“针有真、金有斤、贪有滩、南有难、兼有坚、纤有先”等辨别字音的例子。说明在有的方言中-m尾和-n尾很早就混同了^⑬。明清以后,北京话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为学习与模仿的对象,在这个过程,方言中-m和-n不分的现象就可

^⑫ 方以智《切韵声原》闭口韵独立,但是将“闪、欠”两个咸摄字放在山摄图。万献初已经指出方以智的做法是为了推究古音,并不代表时音。所以这并不反映此音变是词汇渐变的过程,而是由于作者口中已经不能区分两类字音造成的失误。

^⑬ 至于这些方言中的音变过程是否也是语音、词汇都突变,由于材料缺乏,无法判断。





能会被带到北京话中,正如现在有的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时不能区分卷舌音和平舌音一样。后来这种发音的势力不断扩大,逐渐取代了原来的发音。因为这一音变是由于学习者的偏误造成的,这些学习者无法区分-m和-n(或者只在听话时能区分,在说话时不能区分),所以在词汇上出现的几率是均等的,也就是词汇上突变。

当然,以上两种假设也不排除同时存在的可能。

闭口韵的消失还同语音系统自身的调整有关。马学良(2003:38-39)已经指出,汉语中鼻音韵尾同塞音韵尾之间普遍存在依存关系。中古汉语的-m、-n、-ŋ和-p、-t、-k整齐相配,元代以后,由于入声韵尾的变化,这个格局已经打破了,这是造成-m尾并入-n尾的内部原因。语音的系统性是语言经济性的表现,系统性强便于记忆和学习。语音的系统性对语音变化的影响正是在学习者(包括母语的习得者和外来的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5.2 齐齿呼韵母归并

中古开口二等牙喉音字到《中原音韵》中产生了i介音,但是在山、咸、效摄中仍然与三四等字对立:间 kian ≠ 肩 kiɛn; 监 kiam ≠ 兼 kiɛm; 交 kiau ≠ 骄 kieu。二等字的元音是a,三四等字元音是ɛ。到《合韵》中,两类韵母就合流了。这个音变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达:

$$\epsilon \rightarrow a/i_E \quad (\text{音变 8})$$

这个公式是从音位的角度说的。从音值来看,两个韵母的演变方向很可能不同。从《自述集》和现代北京话来看,是ian变iɛn, iɛu变iau。

这个音变在语音上存在渐变的可能性,可是从音变的两个方向来看,更可能是突变的。因为由ian到iɛn的音变比较自然,是主元音受介音影响的变化,可是由iɛu到iau的变化却是相反的方向,并不自然。这就说明这一音变的动力不是来自发音方便的需要,而是另有原因。《中原音韵》四呼格局的雏形已经形成,到明代y韵母的形成标志着四呼格局的确立。这一格局对北京话韵母系统的发展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凡是四呼不整齐的韵母类型都有逐渐向整齐化演变的趋势。下表是山、咸、效摄韵母在《中原音韵》中的情况:

表6 山、咸、效摄韵母在《中原音韵》中的分布

寒山	an	ian	uan	
先天		iɛn		iɛɛn
桓欢			uon	
监咸	am	iam		
廉纤		iɛm		
萧豪	au	iau		
		iɛu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四呼的分布很不整齐。到了《合韵》,齐齿呼和合口呼韵母分别归并,已经和现代北京话一样,四呼的分布整齐多了。其中由uon合并到uan的演变同样也是一个语音、词汇都突变的过程。如下表所示:

表7 山、咸、效摄韵母在《合韵》中的分布

山摄	an	ian	uan	yan
效摄	au	iau		

可见,同音变7一样,音变8也与音系的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的实现过程同样可能





是内部的习得者放弃对立,也可能是外来的学习者的偏误,或者兼而有之。

6. 音变模式的一些规律

以上汉语史的例子说明,音变过程的四种模式实际上都是存在的,比从前设想的更为复杂。下面我们尝试对相关的规律做一些讨论。

第一,演变前后的两个音如果在发音生理上不具备连续性,语音上就只能是突变,如音变3和音变7。

第二,演变前后的两个音如果在发音生理上具备连续性,语音上可能是渐变(音变1和音变2),也可能是突变(音变4和音变8)。

第三,语音突变并不意味着词汇一定渐变,词汇上可能是渐变(音变3和音变4),也可能是突变(音变7和音变8)。后者看似不可思议,但是确实存在。至于语音和词汇都突变是如何实现的,本文提出习得者放弃对立和学习者的偏误两种可能。另外,我们讨论汉语的音变通常是以字音为单位的,而在实际交际中,由于双音节、多音节词语和语境等因素的参与,单个音节中音位的对立负担已经大大减轻了,有些对立会逐渐成为冗余的,这也是语音和词汇都突变得以实现的一个条件。

第四,语音渐变通常词汇突变(音变1和音变2),但是偶尔也会出现词汇渐变的情况(音变5和音变6)。语音、词汇都渐变的实现过程比较难解,我们推测可能是由于个人之间音变速度的差异造成的。词汇渐变会造成音变规则的例外,前提是这种例外要符合演变后的语音系统的音系规则,如果不符合,就需要做出调整。比如音变5形成的例外,由于演变后的系统中没有了 α ,这个音被调整为 a 。

第五,语音渐变可以产生新的音位或音类。我们所说的音类,就汉语而言是指声、韵(传统的韵部,也就是韵基)、调的类别。由于语音是逐渐变化的,可以产生系统中原来没有的音位或音类。一般来说,新的音位往往同时也代表新的音类,但是新的音类却不一定代表新的音位。比如音变1产生的舌面前音声母,既是新的音位也是新的音类^⑭。音变2产生的 ie 形成了新的车遮部,但是并没有产生新的音位。

第六,语音突变一般不会产生新的音位或音类,而是向已有的音位或音类合并。因为语音是一下子由一个音演变为另一个音,所以一般来说不可能凭空产生一个新的音位或音类,而只能同已有的音位或音类合并。

第七,由第五和第六可以推出,如果演变的结果是演变前一阶段的音系中没有的某个音位或音类,一般来说只能是语音渐变的方式形成的。又可以推出,如果是单纯分化(分化出来的音类没有与其他音类合流)的音变,一般来说是语音渐变的过程,因为分化的结果是增加了新的音类。比如音变1,见系声母分化为两套。又如平声分化为阴平和阳平的音变,应该是平声受声母清浊的影响逐渐在调值上产生差异,在浊声母清化之后这种差异便上升为音位的区

^⑭ 见系细音演变为舌面前音是否构成新的音位可能还有争议。直到精系细音也发生腭化与见系细音合流,舌面前音的地位才比较明确。不过,明代以后卷舌音声母后细音变为洪音,与舌面前音互补,原来声母的对立(战 $t_{\text{ɕ}}ien \neq$ 见 $kien/t_{\text{ɕ}}ien$)就可以看作是韵母的对立(战 $t_{\text{ɕ}}an \neq$ 见 $t_{\text{ɕ}}ian$),这种变化应该会对舌面前音的音位归属有所影响。





别^⑮。

第八,合流的音变语音上主要是突变。如音变3,疑母与零声母合流;音变4,皆来韵细音与车遮韵合流;音变7,-m尾与-n尾合流;音变8,山、咸、效摄齐齿呼韵母归并。语音渐变也有造成合流的可能。不过,如果语音渐变,最终的合流又是如何实现的呢?是渐变进行到某一阶段时转变为突变吗?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拉波夫提出近似合并(near-merger)的概念,证实即使说话人也不能区分的语音形式也可能只不过是一种“近似合并”(参看 Labov, 1994:349-370)。近似合并很可能是由渐变到合并的一个关键的过渡环节。汉语史上尖团合流的音变(ts→tɕ/_i,y)就可能是精系细音逐渐顎化并与先顎化的见系细音合流。

王士元、沈钟伟(1991)认为:“如果是造成音位改变的音变,这种音变必然会以词汇扩散的方式为其变化机制。”从上下文来看,他们所说的“音位改变”是指音位合并。音位合并可能以语音突变的方式为多,但是词汇上却不一定是渐变的,而且还有近似合并这种语音也渐变的可能性。

7. 结语

本文结合汉语史对音变过程的规律做了一些探讨。音变的过程非常复杂,把握其中的规律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历史上已经发生的音变会有积极意义。

首先,可以通过音变的结果推测音变的方式。比如《中原音韵》的支思和车遮是两个新的韵部,那么产生这两个新韵部的音变在语音上就应该是连续的。这种音变在词汇上通常是突变的,所以这两个音变基本上没有例外^⑯。

又如中古汉语的入声韵尾 p, t, k 到现代汉语中都消失了。这三种韵尾大概在宋代先合并为ʔ,到元代以后才逐渐消失。合并的音变应该多是语音突变,可是这个ʔ是个新的音位,又应该是语音渐变形成的。从相关的材料来看,三种韵尾并不是先合并为其中某一个,结合三种韵尾的语音性质,演变的过程很可能是 k 先变为ʔ(语音渐变),然后 p 和 t 又与ʔ合并(语音突变)。语音突变,词汇并不是一定渐变。入声韵尾合并的过程很快,所以我们更加倾向于这个音变在词汇上也是突变的。

其次,可以通过音变方式解释一些复杂的音变现象。比如从谐声、通假等现象来看,汉语很可能曾经存在 kl-类的复辅音声母:各 k-/貉 f-/洛 l-;京 k-/黥 g-/凉 l-。kl-→k-和 gl-→l-是个不错的假设,可是因为在谐声系列里还同时出现了浊声母字,分化条件不明确。复声母失落其中一个成分的演变在语音上只能是突变的,那么在词汇上就极有可能是渐变的。这个音变过程中可能有其他音变的干扰,造成了不规则的现象。

又如中古一二等元音的对立到《中原音韵》中基本上消失了(a→a),可是在“萧豪”韵中却保留了一部分一二等对立的小韵:褒≠包_二;宝≠饱_二;抱≠豹_二。同时,在对立的小韵中又有出现了一二等相混的:抱_二=鲍_二;豹_二=瀑_二。这个音变在发音生理上虽然存在连续性,但是既然是合并的音变,在语音上很可能是突变的,在词汇上则可能是渐变的。特别是对立与相混共存的现象,说明当时可能存在两读的情况,由于两读并存,会造成错误的类推,有人把原来的一部分二等字也念成一等,甚至有人放弃了这些字二等的读法,于是造成《中原音韵》所

⑮ 或者是声调的差异使得清浊的区别成为冗余,促成了浊音清化。

⑯ “徙玺”等例外是避讳(避免与“死”同音)造成的,不是自然音变的结果。





记录的情况。

本文讨论的是历史上已经发生的音变,要对这些音变过程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还有赖于社会语言学将来的发展。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2003 《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语文出版社。
- 陈 燕 2003 《“爹”字二音考》,《辞书研究》第3期。
- 丁治民 2013 《麻遮分韵时代考——兼论〈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语言研究》第2期。
- 冯胜利 叶彩燕(编) 2014 《拉波夫与王士元对话——语音变化的前沿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 耿振生 1992 《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
- 宫钦第 2008 《胶东方言的历史演变》,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金世一(编) 牟 萍 马文熙(译) 1983/1997 《汉字古今中外多语音比较字典》,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子君 2012 《论〈礼部韵略〉与〈集韵〉的差异》,《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期。
- 李子君 2014 《〈礼部韵略〉〈集韵〉透露的车遮韵信息》,厦门大学中文系、中国音韵学会编《中国音韵学暨黄典诚学术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
- 梁 敏 1987 《两代人之间的语音变化》,《民族语文》第3期。
- 刘广和 1991/2002 《东晋译经对音的晋语声母系统》,刘广和著《音韵比较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刘广和 2001/2002 《西晋译经对音的晋语声母系统》,刘广和著《音韵比较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卢甲文 1992 《郑州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 鲁国尧 1991 《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中国语言学报》第4期。
- 马学良 2003 《汉藏语概论》,民族出版社。
- 沈钟伟 2006 《辽代北方汉语方言的语音特征》,《中国语文》第6期。
- 万献初 2012 《近古百种韵书-m韵尾消变的历时进程》,《励耘学刊(语言卷)》第二辑,学苑出版社。
- 汪化云 2008 《汉语方言代词论略》,巴蜀书社。
- 王洪君 2014 《历史语言学方法论与汉语方言音韵史个案研究》,商务印书馆。
- 王 力 1958/1988 《汉语史稿》,《王力文集》第九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 王士元(著) 石 锋 廖荣蓉(译) 1969/2002 《竞争性演变是残留的原因》,《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王士元 沈钟伟 1991/2002 《词汇扩散的动态描写》,《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威妥玛 1886/2002 《语言自述集》,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徐通锵 1991 《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
- 徐通锵 王洪君 1986 《说“变异”——山西祁县方言音系的特点及其对音变理论研究的启示》,《语言研究》第1期。
- 薛凤生 1986 《北京音系解析》,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殷国光 龙国富 赵 彤 2016 《汉语史纲要》(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俞 敏 1984/1999 《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曾光平 张启焕 许留森 1987 《洛阳方言志》,河南人民出版社。
- 赵荫棠 1936/1956 《中原音韵研究》,商务印书馆。
- Labov, William 1981 Resolving the Neogrammarian controversy. *Language*, 57(2): 267-308.
- Labov, William 1994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Internal Factor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赵 彤 北京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 中心 drjaudong@pku.edu.cn





ZHONGGUO YUWE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January, 2019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ZHAO Tong, Types of sound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addition to the two types of sound change supported respectively by the Neogrammarians and the theory of lexical diffusion, i.e., phonetically gradual but lexically abrupt change, and phonetically abrupt but lexically gradual change, two more types are attested, that is, gradual change on both phonetic and lexical level, and abrupt change on both phonetic and lexical level.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sound changes, it is believed that pure split is usually phonetically gradual while merger is probably phonetically abrupt. Near-merger is probably the transition from phonetically gradual change to merger.

Key Word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ound change, gradual change, abrupt change, split, merger

AKITANI Hiroyuki, NOHARA Masaki, The rounded-vowel hypothesis in Old Chinese and Min dialects

The rounded-vowel hypothesis, first proposed by Sergej Jaxontov (1960), is one of the basic studies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ix-vowel system in Old Chinese. Modern Min dialects still preserv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unrounded vowels and rounded vowel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words ‘*quán* 泉’, ‘*fǎn* 反/*fàn* 飯’, ‘*fá* 發/*fà* 髮’ and ‘*guò* 過/*guō* 裹, *hé* 禾’ in Min dialects to support the hypothesis and shows that the most archaic phonological stratum of Min dialects possibly dates back to the period as early as the 3rd century BCE.

Key Words: Old Chinese, rounded-vowel hypothesis, Min dialects, phonological stratum

XING Xiangdong, MA Mengling, Lexical tone of Northwest Mandarin and its relation with citation tone and tone sandhi

Lexical tone in this paper refers to the tone which occurs in the words or phrases of two or more syllables, and which cannot be inferred from the sandhi of citation tones in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Lexical tone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citation tone and the tone sandhi; however, the latter two are on the phonological level, while lexical tone is related to morphology and syntax. Five features of lexical tone are illustrated, including that it has limited types, presents fixed forms, exhibits conformity between high/low pitch and long/short or stressed/unstressed syllables, shows initial syllable controlling, and has earlier stratum than its corresponding citation tones and tone sandhi. Two methods are proposed to distinguish the three concepts above. On account of the situation in Northwest

